



全球浙商研究丛书

GLOBAL ZHEJIANG ENTREPRENEUR STUDIES

# 产业集群升级、区域经济转型 与中小企业成长

——基于浙江特色产业集群案例的研究

Industrial Clusters Upgrading,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of SMEs  
——Case Studie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with  
Zhejiang Characteristics

卫龙宝 阮建青 傅昌銓◎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球浙商研究丛书

GLOBAL ZHEJIANG ENTREPRENEUR STUDIES

## 产业集群升级、区域经济转型 与中小企业成长

——基于浙江特色产业集群案例的研究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Industrial Clusters Upgrading,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of SMEs  
——Case Studie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with  
Zhejiang Characteristics

卫龙宝 阮建青 傅昌奎◎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产业集群升级、区域经济转型与中小企业成长：基于  
浙江特色产业集群案例的研究 / 卫龙宝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0  
(全球浙商研究丛书)  
ISBN 978-7-308-09182-4

I. ①产… II. ①卫… III. ①中小企业—产业化发展  
—研究—浙江省 IV. ①F81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5251 号

## 产业集群升级、区域经济转型与中小企业成长 ——基于浙江特色产业集群案例的研究

卫龙宝 阮建青 傅昌奎 著

---

丛书策划 樊晓燕 陈丽霞  
责任编辑 樊晓燕(fxy@zju.edu.cn)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6 千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182-4  
定 价 3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 总序一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将会逐步增强。党的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益改善。宪法修正案对保护私有财产法律制度的完善,“非公经济 36 条”和“新 36 条”的相继出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制度保障,也为民营经济的明天注入了更多的信心。

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禀赋、人文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通常都表现出一些鲜明的“区域特色”,它们也因此被人们习惯性地冠以区域商帮的标记。晋商、徽商、鲁商、粤商、沪商、宁波帮,这些至今仍为人们熟悉的明清时期和民国初年的代表性商帮,无不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浙商作为一支来自民间的草根力量迅速崛起,在全国各个省份乃至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浙商勤劳的身影。最近几年来这些浙江籍企业家所创办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强大浙商军团,无不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浙商已当之无愧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出色的商帮之一。对于这样一个极富活力的商人群体,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先后从“温州模式”、“台州模式”等侧面对浙商这一主题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可是相较浙商对全国和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力,这些工作依然尚显薄弱。浙江资源禀赋并不丰裕,国家投资殊为稀少,外商投资相对不多,其经济发展缺乏自然资源的支撑和外部力量的推动,何以能够在短短 30 年的时间里跃居中国经济最强省?客观评价浙商在过去发展中取得的各项业绩,系统归纳和总结浙商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无论对指导浙商未来的发展,还是对促进后发地区民营经济的提升,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家

“促进区域协调互动发展”的政策导向下,这项工作的价值无疑将得到更大的体现。

当前,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脆弱的金融系统、主权债务压力,以及主要国际货币兑换汇率的大幅波动,导致世界经济环境依旧比较低迷。同时,面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日益加大的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仍然偏紧。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压力,民营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可以说,单靠人民币低汇率来扩大产品销路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如何尽快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打开国际市场,已成为摆在以传统制造见长的浙商面前的一道难题。在此背景下,深入了解浙商,系统总结和分析浙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指导它们适时创新原有的商业模式,勇于拓展新兴的业务领域,不断培育全新的竞争优势,无疑对促进浙江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将变得日益紧密,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将会逐步加大。未来,浙商融入全球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将会进一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崭新的课题将会不断涌现,紧密追踪,甚至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及时指导浙商趋利避害、长善救失,显然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从学术研究或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对浙商这样一支富有创业精神的商业力量开展系统的跟踪研究,无论对现有理论的检验和提升,还是对新兴理论的构建与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作为一所深深扎根于浙江这块创业沃土的全国著名商学院,长期以来跟浙商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对浙商有着全面的了解和把握,由他们组织力量来对浙商进行全面的解剖无疑是最为合适和最具优势的。此外,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一直以创新和创业为办学特色,在多个相关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这与整个“创新、创业”的大环境、大趋势也是匹配的。相信在其组织和协调下,学者们一定能够围绕“浙商”这一主题做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相信这些成果的出版和发行对指导浙商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推动现代商帮和民营经济研究,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让我们共同期待!

顾以辛

2011年10月1日

## 总序二

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较为活跃的一股力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浙江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浙江商人再次活跃于海内外商界,并日渐成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商帮之一,形成了“有浙商就有市场”的独特现象。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浙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和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对新时代浙商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有着更多更高的期许和要求。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浙商如何自我超越,继续勇立潮头,再续辉煌,如何做大做强品牌,成功实现自我延续与更新,已成为浙商的首要课题。在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扮演起“先富者”的角色,发挥示范作用,真正带动落后或欠发达地区共同富裕起来,应是浙商不断追求和勇担的时代责任。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重要载体作用,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宣扬中国当代企业家精神,传播区域和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也是浙商肩负的提振文化软实力的另一重要使命。

近年来,随着浙江商人在国内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商帮这个沉寂已久的话题再次成为各类媒体关注的热点,“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在被各类媒体争相报道的同时,也日渐成为学术界的热门研究议题,许多浙商的成败经历更是逐渐成为国内外知名商学院的经典教学案例。组织一批专业力量对浙商做出全面且系统的解读,在更好地指导浙商发展的同时,为更大范围内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发展出可以影响主流经济和管理理论演变趋势的新理论、新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是国内一流的商学院,长期深深扎根于浙江这片创业沃土,同许多浙商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对浙商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先后围绕公司治理、创新创业、产业集群等主题对浙商开展过大量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取得了

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无论从已取得的科研成果、锻造的科研能力看,还是从打造科研特色、赢得社会声誉的考虑,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都已具备对浙商开展系统研究的基础和实力。我深信并期待,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科研团队的领导下,浙商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为浙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的同时,对国际主流经济和管理理论产生真正深远的影响。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金德水

2011年10月

## 摘 要

### (一)

浙江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其成功奥妙在于集群式成长的浙江中小企业。

“浙江模式”从根本上而言是指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市场网络为纽带、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或者称之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这种模式具体体现在浙江中小企业以“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集群式发展形态上。浙江省以中小企业为主力军的工业化过程是与产业集群的生产组织形式密切相关的。产业集群提供了中小企业成长的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

集群式成长的中小企业既具有明显的优势也具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马歇尔认为产业集群通过如下三种方式给集聚的企业带来了外部规模经济:(1)区域内的技术、信息外溢;(2)提供共享的中间投入品;(3)提供区域专用性劳动力市场。此外,产业集群对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萌芽阶段的中小企业还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产业集群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工业化的进入壁垒。其次,产业集群在空间上的集聚使得企业间的重复交易变得特别频繁,集群内企业重复交易的特性使得生产链条上的生产者能够在不用任何正规合约的情况下协调生产,这有效地降低了分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再次,产业集群通过分工将企业家才能要求很高的一体化生产组织形式,分解成了企业家才能要求较低的分工作协作生产组织形式,才能禀



赋各异的潜在企业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相应的分工类型进入工业化,通过这种机制,发展中国家稀缺的企业家才能被充分动员起来,并且在动态过程中,企业家才能得到了培育。

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集群式成长的中小企业所具有的局限性。如集群内的过度价格竞争常常导致产品质量危机,集群内企业的相互模仿降低了企业开发新产品的意愿等。

## (二)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开始就严重冲击了我国的实体经济。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我国在出口贸易、金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等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浙江的中小企业在此艰难时期,面临的不仅有历史遗留问题,还有金融危机后带来的各种突发性困难:(1)原材料、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2)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3)劳动用工紧缺程度比较突出;(4)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偏低;(5)企业税费负担加重;(6)节能降耗方面的要求提高。一些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的浙江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与发展压力更大。

在严峻的危机背景下,全面地了解金融危机对浙江中小企业的传导有助于企业更深刻地认识危机以及更好地应对危机带来的挑战,有助于我们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使浙江中小企业能够在逆境中实现突围。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实体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我们针对浙江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实际发展情况,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梳理出金融危机影响浙江中小企业的十大传导机制。

宏观层面的传导机制:(1)国际需求—产能过剩—企业减产;(2)货币汇率—产品价格变化—外贸受损;(3)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壁垒—企业出口受阻;(4)流动性需求—资本市场—企业融资困难。

中观层面的传导机制:(5)产业链条—产业联动—产销削减;(6)产业集中度—劣势环节剥离—产业布局调整;(7)集群边界—集群升级—内外资源整合。

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8)集群生命周期—企业优胜劣汰—行业洗牌;

(9)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企业成本收益—决策风险增加;(10)经济衰退—预期需求—企业减产。

金融危机在国际市场环境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主要通过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市场进行传导。从国际市场环境来看,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上升以及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分别通过汇率传导机制和贸易传导机制阻碍了浙江产业集群企业的外贸出口。从产品市场来看,由于国际市场对集群生产的产品需求锐减,产业联动效应使整条产业链各环节供求削减。从资本市场来看,因投资者对资本的流动性需求增大,同时金融机构对集群企业的资金信贷审核要求更严格,使部分集群企业融资困难,甚至资金链断裂。此外,企业家由于对产品市场信心不足,对市场需求下降的预期使他们降低产销;投资者由于对资本市场信心不足,对企业资金放贷风险上升的预期使他们谨慎信贷。

以上三个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这体现在:第一,浙江集群企业因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贸易壁垒等因素降低了产品竞争力,从而在产品市场上受挫;第二,在产品市场上受挫的许多企业因资金不足而求救于资本市场;第三,资本市场中的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考虑到一些企业的信贷风险较高而提高贷款条件,导致这些集群企业融资困难。

在上述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浙江产业集群经自我调整、修复后出现了以下三种局面:第一,集群内企业或破产倒闭、或资产重组、或兼并收购,通过企业优胜劣汰加速了行业洗牌;第二,集群产业链的弱势环节得以剥离,通过企业迁移或产业转移,优化了产业布局;第三,集群内外资源得到整合,通过合理配置集群内外企业、行业协会、政府和科研机构等各方资源,重构了集群组织。

### (三)

浙江中小企业面临要素价格上涨、市场需求萎缩、融资困难等压力,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未来的发展前景面临严峻挑战。对于浙江中小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但也可能是一个转型升级的契机。

通过对浙江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温州鞋业产业集群、永康五金产业集群、嵊州领带产业集群、台州医药化工产业集群、大唐袜业产业集群和分水

制笔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如果能够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促进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家共同采取行动,帮助浙江广大中小企业实现逆境突围,那么不仅能够实现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而且能够促进浙江整个区域经济的转型。

首先,宏观制度环境的改革:(1)土地制度的改革;(2)小城镇强镇扩权的改革;(3)金融制度改革。

其次,地方政府的应对举措:(1)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2)制定相关产业引导政策;(3)完善要素资源的保障支撑;(4)培育龙头企业、宣传集群品牌。

第三,集群企业的应对举措:(1)加快技术升级;(2)增强创新能力;(3)实施品牌战略。

第四,集群层面的应对举措:(1)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2)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3)利用集群效应实现中小企业国际化;(4)充分利用电子商务来降低成本。

# ABSTRACT

## I

The secret to Zhejiang'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lies in its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of SMEs.

Fundamentally, "Zhejiang mode" is a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t is a model which "relied on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ies, connected by market network, and based on market economy", or put it more intuitively, is a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Commerce-driv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mall Commodities, Big Market" strategies. This model embodied in the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in Zhejiang labeled by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One Town, One Industry". The key role played by SMEs in Zhejiang'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form of produc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Cluster not only provides a growth environment for SMEs, but also facilitated its realiza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of SMEs has obvious advantages as well as inherent limitations. Alfred Marshall once noted that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 can bring economies of scale with the following three forces: (1) technological and information spillovers, (2) specialized

suppliers of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3) labor pooling. In addition, the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has its special implications for SM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irst, industrial clusters can help SMEs overcome the barriers-to-entry of industrialization.

Second,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facilitated frequent, repetitive transactions among enterprises within the cluster, and this repetitive feature effectively lowered transaction cost because the producers along the value chain can coordinates their production more easily without any formal contract.

Third, through the division of labor, cluster-based co-operate system decomposed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production that require extraordinary entrepreneurial abilities into the one with less demanding forms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Thus, potential entrepreneurs may choose the appropriate type of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ndowments and resources. With this mechanism, the entrepreneurshi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uld be fully mobilized and also further cultivated through a dynamic interaction process.

However, we should not forget the fact that the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of SMEs may also have limitations. Excessive price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lusters often leads to quality crisis. Simple imitation with each other within the cluster apparently reduced the enterprises' willingnes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 II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d its impact on China's real economy immediately. The worsen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seriously undermined China's export, financ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employment. In the difficult time, SMEs in Zhejiang were facing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issues but also unexpected difficulties brought by the crisis: (1) cost increases in raw materials, labor, land and other factors; (2)

difficulties in financing; (3) shortage in labor supply; (4) irr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ower industry-level; (5) burdened by corporate tax; (6) tightened requirements for energy saving. Some SMEs on the lower-end of the value chain were suffering greater pressure o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severe crisi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risis on SMEs in Zhejiang will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and better response to the crisis, to propose 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 and to help SMEs achieve breakthrough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cesses and links from the financial system disorder to the overall decline in real economy, which could be best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With the actual experience of Zhejiang SMEs during the crisis, we propose Top-10 financial crisis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t the macro-level: (1) international demand over-capacity of production production cutback; (2) exchange rate changes in product prices international trade shrink; (3)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trade barriers export unsmooth; (4) demand for liquidity capital markets enterpris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t the meso-level: (5) the production chain industrial linkage reduction in production and sales; (6)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strip off low-contribution links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7) cluster boundaries Cluster upgrading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t the micro-level: (8) cluster life-cycl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reshuffle of the industry; (9) international primary commodity prices cost-benefit of enterprise increased risk in decision-making; (10) economic recession the expected demand enterprise production cutback.

The transmission of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unfavorable international market environment is mainly through product and capital market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nvironment aspect, the rising of nominal exchange rate of RMB against the U. S. dollar brought popularity of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hindered export of clusters in Zhejiang through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exchange rate and trade. In the product market aspect, the sharp decline in international demand transmitted along the whole value chain through industrial linkage effects. In the capital market aspect, due to increased demand for capital liquidity and ever-tightening credit rationing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me enterprises suffered deeply from financial difficulties or even result in money-strand breaks. In addition, the negative expectation in demand made many entrepreneurs reduce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while increased credit risk destroy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capital market and more and more cautious investors.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are intertwined rather than isolated. First,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Zhejiang production was disappointed by withering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 escalating trade barriers and other unfavorable factors, resulting in the setbacks in product markets; then the setbacks make many enterprises turn to capital market for help; however,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ow will tighten the credit policy because of the bad default risk, which in turn unfortunately result in a dead-end loop for SMEs' financing demand.

With all these interaction above, the following three kinds of situations resulted from self-adjustment and recovering of Zhejiang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first result is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of assets, o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within the clusters, which accelerated corporate industry reshuffle through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process; the second is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ccomplished through stripping off the vulnerable links in value chain, and business migration/transfer; the third result is restructuring the whole cluster through the rational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such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terprises, industry associations, government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 III

Burdened with the inflation of factor prices, shrinking of market demands and financing difficulti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MEs in Zhejiang will have to tackle many challenges. It could be a difficult time, but may also be an opportunity for upgrading.

Based on case studies of woolen sweater cluster in Puyuan, leather shoes cluster in Wenzhou, hardware cluster in Yongkang, tie cluster in Shengzhou, pharmaceutical and chemical cluster in Taizhou, hosiery cluster in Datang, and pen cluster in Fenshui, we come into conclusion that, through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entrepreneurs to help SMEs achieve breakthrough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it will not only realized the upgrading of clusters in Zhejiang, but als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tire regional economy.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the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implication for macro-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1) reform in land institutions; (2) power expansion of economically strong town; and (3) reform in finance system.

Secondly, implication for local government: (1) build a sound public service system; (2) propose industrial policies to guide cluster development; (3) improve the supply of factor resources; and (4) cultivate champion enterprises and build cluster brand.

Thirdly, implication for enterprises in clusters: (1) accelerate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2) strengthen innovation ability, and (3) implement brand strategy.

Fourthly, implication for clusters development as a whole: (1)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2) fost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luster, (3) achiev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Es through clustering effect, and (4) promote cost-cutting through e-commerce.



第 1 章 总 论 .....	1
1.1 产业集群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 .....	1
1.2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	6
1.3 产业集群与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 .....	7
1.4 产业集群升级与区域经济转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内在联系 .....	9

## 上 篇

第 2 章 发展历程——集群式成长的浙江中小企业 .....	15
2.1 浙江省工业化发展概况 .....	15
2.1.1 浙江经济总体发展概况 .....	15
2.1.2 农村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	19
2.1.3 推动浙江农村工业化的企业主体和行业分布 .....	20
2.2 集群式成长是浙江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	25
2.3 集群式成长的中小企业的优势与局限 .....	30
2.4 本章小结 .....	31
第 3 章 成长困境——金融危机的现实冲击及其传导机制 .....	33
3.1 金融危机后浙江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冲击与挑战 .....	33
3.1.1 金融危机后国际主要经济体的运行情况分析 .....	33
3.1.2 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	34